

2018 我的梦想成了真

脱单了

余雪燕 福建厦门同安区 公务员

这两年流行在朋友圈里许愿，我也不能免俗，每逢新年来临第一秒，就许下同一个愿望——今年一定要脱单！

在我不长不短的26年人生里，说出来不怕人笑话，我居然没有谈过一场恋爱。

更可笑的是，如我一般老大小却没有过恋爱经历的女生居然不少。于是我们这群人前单身主义、人后寂寞空虚的大龄剩女在聚会时总是指天发誓：“今年一定要脱单！”

但“懒癌”晚期的剩女团里，似乎只有我行动起来了。我开始在家人安排下频繁相亲。

第一个见面的A男是个建筑设计师，不但个头高挑，还眉清目秀，是我钟情的那种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美男子。奈何美男钟情的男人不是我。

第二个见面的B男有房有车，是个公务员。可我们聊天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他的前女友……

林林总总相亲过来十个奇葩的和不奇葩的男生后，终于出现了个令我印象深刻的X男。

他农村出生却不卑不亢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；年纪轻轻又凭本事当上了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；父母虽年迈，却身体硬朗、通情达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第一眼见到我似乎就坠入了爱河，整张脸红得像苹果。

家人朋友都说我中彩票了。可我打死都不愿再见X君一面。因为相亲结束后，

他十分诚恳地表示要把自己那辆价值40多万元的大众途观送给我。

“兴许，他觉得我是个可以用钱买的女孩！”年轻气盛的我礼貌地拒绝了他，转头删了所有关于他的联系方式。

一个月后，红娘才终于弄明白我俩这对“年度最看好情侣”为什么没成。红娘解释了一大堆，简而言之就是：X君是个直得不能再直的大直男。

好吧，我原谅他了，但依然拒绝了他再次见面的请求，理由是：好马不吃回头草。

之后，我拒绝了家人安排的各种相亲，因为疲惫，因为心累，还因为每次相亲我都得起个大早，磕磕巴巴化上不太精致的妆容，对着一个陌生人“呵呵呵”笑上两小时。

我难道又要在人间漫无目的地游荡一年，依旧没有找到归宿？直到我和我未来的婆婆上了眼。

听说那天我在食堂吃饭，未来的婆婆在茫茫人海中一眼相中了我。

得知此事的我也暗自打听了对对方一番，条件不错。

我亲自给自己安排了一次相亲。结果喜人，我和我未来的丈夫在相恋的6个月里，经历了一般恋人要花两年时间才会经历的憧憬、热恋、冷淡、怀疑、争吵、分手、复合、订婚等8个阶段。

2018年，我不仅告别了大龄剩女团，明年还要当妈了。人生，果真是世事无常。

阿旺结婚“三进表”

阿旺平措 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副队长

今年10月25日，我和妻子卓玛满心欢喜领了结婚证，然而这一刻竟足足迟到了7年！

2013年7月21日，我满怀憧憬地拿着结婚证去履行审批程序。那天，确定恋爱关系已有两年的女朋友卓玛答应嫁给我。

卓玛是一名警察。我们的工作单位距离也就60多公里，车程不到40分钟，但由于工作需要，有时一个月难见一面。两年相识相恋，我和她最终得到双方家人的认可并在各自单位通过了相关程序，定于当

年8月13日到民政局领结婚证。

谁知距离领证还有一周时，我被派往那曲执行任务。临行前，我满怀愧疚地给卓玛打电话致歉。她懂得部队的纪律，全力支持我安心工作。可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一别就是一年。

2015年8月1日，我和卓玛拿着结婚证明去民政局的路上，她接到爷爷突发脑溢血去世的噩耗。自小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卓玛瞬间几乎崩溃。我们半路折回单位请了假，赶赴卓玛家帮助

操办爷爷的丧事。我拉着她的手说：按照传统习俗，你要为爷爷守孝一年，我等你。她还没从悲痛的情绪中缓过来，只是含着泪默默点头。

这一等，又是3年时间。其间，2016年2月，卓玛被派往内地学习一年，归队后奉调新的工作岗位，而我于当年8月参加培训，才会有信心一起干。企业负责人和我谈定了收入分配比例，地方我出，人力我出，收入双方各一

半。说实话，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啊。

今年年初，合作企业帮我家改造厨房，建大厨房，还专门请大厨过来教我们如何把饭菜做好。现在，我家新建的3间房全部被我改成了包间，可以安放近10张餐桌。所有费用由企业掏，说是要把我家打造成样板间，要让周边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，才会有信心一起干。企业负责人和我谈定了收入分配比例，地方我出，人力我出，收入双方各一

主任商量，他们特别支持我，还帮我找企业谈合作。

今年年初，合作企业帮我家改造厨房，建大厨房，还专门请大厨过来教我们如何把饭菜做好。现在，我家新建的3间房全部被我改成了包间，可以安放近10张餐桌。所有费用由企业掏，说是要把我家打造成样板间，要让周边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，才会有信心一起干。企业负责人和我谈定了收入分配比例，地方我出，人力我出，收入双方各一

半。说实话，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啊。

今年年初，合作企业帮我家改造厨房，建大厨房，还专门请大厨过来教我们如何把饭菜做好。现在，我家新建的3间房全部被我改成了包间，可以安放近10张餐桌。所有费用由企业掏，说是要把我家打造成样板间，要让周边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，才会有信心一起干。企业负责人和我谈定了收入分配比例，地方我出，人力我出，收入双方各一

农家乐，乐农家

殷万平 宁夏固原 大湾乡杨岭村村民

我今年51岁，土生土长的宁夏固原杨岭村人。过去我家世代种地，到我这一代，种地的收入比较低，便开始养牛。不过从去年开始，村民们都把自家的牛交给企业去养，每年能拿到分红。我把自己的3头牛全部托管给村上的企业，农闲时便出去打工。

我去了不少地方，最近是在海原高速公路上打工。我有手艺，在工地上干细活，每个月收入还不错。今年大概挣了近3万元，加上养牛的分红，收入比种地

多。但也有个大问题，就是顾不了家，老人照顾不了，孩子的成长也耽误了。

这两年，我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恰好赶上县乡两级政府准备在杨岭村和周边几个村搞乡村旅游，种花田花海。我打工时见到过外地的村子搞农家乐，住宿、吃饭、钓鱼……城里人玩得热闹，村里人挣得开心。我当时在心里大概算了算办农家乐的收入，应该比打工挣得多。我动了心思，就去找村支书和村委会

主任商量，他们特别支持我，还帮我找企业谈合作。

今年年初，合作企业帮我家改造厨房，建大厨房，还专门请大厨过来教我们如何把饭菜做好。现在，我家新建的3间房全部被我改成了包间，可以安放近10张餐桌。所有费用由企业掏，说是要把我家打造成样板间，要让周边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，才会有信心一起干。企业负责人和我谈定了收入分配比例，地方我出，人力我出，收入双方各一

半。说实话，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啊。

今年年初，合作企业帮我家改造厨房，建大厨房，还专门请大厨过来教我们如何把饭菜做好。现在，我家新建的3间房全部被我改成了包间，可以安放近10张餐桌。所有费用由企业掏，说是要把我家打造成样板间，要让周边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，才会有信心一起干。企业负责人和我谈定了收入分配比例，地方我出，人力我出，收入双方各一

半。说实话，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啊。

“路长”也神圣

刘靖虹 福建厦门湖里区文明办 科员

小时候，我就有一个“城管梦”。尽管后来没有机会成为一名城管，但始终怀着这样的想法和期盼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了一名公务员，因工作岗位性质，总是待在办公室里，没时间和机会到基层沾沾泥土，总是为不能给社区居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感到遗憾。

有梦想就有追求。今年是我梦想成真之年。我所在的区委区政府发出机关干部下到社区当“路长”的号召，（路长，顾名思义，就是“一路之长”，包干路段出现什么问题，路长都得介入）。每个机关干部都认领一条路，每周到路上去巡查，哪里有卫生死角、

哪里有违章搭盖、哪里有乱停车、哪里有占道经营……“路长”都得去协助解决。我高兴极了，这可是实现儿时“城管梦”的机会。我带上“小红帽”，走在属于自己包干的路上，心中满满的自豪感和责任感。

有一次，我在路上巡查时，看到一个阿姨在摆摊卖烧饼。我主动上前制止，告诉她这属于占道经营。阿姨说：“小妹啊，我们做点儿小本生意不容易，你就甭管那么宽了。”虽然我心里非常同情她，但头顶上的小红帽时刻提醒着我，如果不管，这个区域的市容秩序会因为我的“同情”而遭受损害。我将心比心地和她讲道理，告诉她占道经营

的不良后果，并且建议她到附近的农贸市场申请一个摊位。经过我耐心劝说，阿姨撤走了临时摊位。

有一次，我在金山路巡查时，发现公交车站有一位扛着大蛇皮袋的大爷在等公交车。或许是要等的车还没到，大爷便打开袋子，抓出一大把花生当场吃了起来，直接把花生壳丢在地上。周围市民窃窃私语，却无人上前制止。在没当上“路长”前，我或许也会睁只眼闭只眼，但现在的我带着“红帽子”，顶着“路长”这个神圣的头衔，这给了我满满的勇气和责任感，给了我管理这条路上发生的一切不文明行为的底气。于是，我主动上前对大爷说：“您好，我是这条路的路

长’，随地乱扔垃圾是不文明的行为，旁边就有个垃圾桶，您可以扔到那儿去。”于是，我蹲下来帮他捡花生壳。大爷红了脸，有些不好意思，马上跟着我一起捡起地上的花生壳。

这样的小事虽然微不足道，但是给了我很多鼓励，让我勇敢承担起“路长”的职责。每次我在路上巡查、帮助市民解决问题时，内心总是充满了快乐和满足。

“路长”制让我实现了梦想。今后，我还会一如继往地延续这个梦想，当好“路长”，纠正不文明行为，为提升城区文明水平添砖加瓦，让这座美丽城市更美好。

（徐林整理）

迁入新村落 开始新生活

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旧村，地处偏僻山区，交通不便，土地贫瘠，是典型的贫困村。村里158户418人，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。2016年8月，下岸村被列入河北省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项目，开始实施整体搬迁。新村安置区地势平坦，交通便捷，占地125.88亩，建筑面积10810平方米，集中安置房92处，水、电、路等基础设施完备。如今，该项目竣工，村民陆续迁入新居，红红火火过起新生活。



2018年10月20日，新婚的新郎张合和和新娘张文红在下岸村新村院子里处理玉米。

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



下岸村旧村（上）和新村对比。

张斌摄（新华社发）